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Effects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Changing on Family Pens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actors

Zou, Tiedi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10 September 2016

Online at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79760/>

MPRA Paper No. 79760, posted 23 Jun 2017 04:22 UTC

人口冲击、环境变动与家庭养老

——基于多因素分解视角

邹铁钉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310018)

摘要: “室谓夫妇所居, 家谓一门之内” (朱熹: 《诗集传》) 以及 “孝于亲, 所当执” (王应麟: 《三字经》) 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群聚而居的亲情生活。这些温馨场景的背后却隐含着长者权威对家庭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绝对控制, 这也是过去数千年中家庭代际更迭和内部成员互惠利他行为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然而, 随着计划生育、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道德习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家庭结构, 从儿孙膝前萦绕的金字塔型变成了子孙门罗可雀的倒金字塔型。然后是居住方式, 从激发同情心的共室而居变成了疏远情感的分散而居。其后是亲子关系, 从驾驭和臣服变成了基于感恩、亲情和追求平等的互利互惠。但要特别关注的是, 当一个家庭同时出现生育数量不够和生育质量不高的问题, 养老资源的充裕性和多样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只有调动政府、社区和市场的参与积极性, 努力构建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 才能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为老年人创造舒适而富足的晚年生活。

关键词: 人口冲击; 人口流动; 生育率; 家庭养老; 赡养

引言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道出了“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的赡养伦理。子嗣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裕度和多样性, 这也是多子多福观念广为盛传的经济动因。

在老龄化、低生育率和经济市场化的共同作用下, 子欲养而力不足和子欲养而亲不待 (《孔子家语·卷二, 致思第八》) 的问题日趋明显。当前,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 2 亿, 人口占比接近 15%,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 1.4 亿, 人口占比超过了 10%,^① 老龄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 中国老年抚养比早在 2015 年就已低于 2.87: 1,^② 平均不到 3 个年轻人就要养活 1 个老人, 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 一对夫妻至少要养活 4 个老人, 生活压力极其沉重。

此外, 中国还是当今世界唯一失能老年人口^③ 超过 1000 万的国家, 多达 4000 万, 而全国现有社区中拥有齐全服务设施的却不到 35%, 拥有完善公共服务的不到 40%, 并且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事件的竟然高达 67%。^④ 现有福利体系无法满足老年人与日俱增的护理需求, 失能老年人在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和医疗陪扶方面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照料压力。

与此同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 当前流动人口规模已经高达 2.5 亿,^⑤ 随之而来的空槽家庭和对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成了一大社

①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EB].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421).

② 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5) [EB]. 新华网, 2015-06-3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30/c_127967441.htm.

③ “失能老年人口”是指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④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 (2015) [EB]. 人民网, 2016-02-2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225/c1001-28147811.html>.

⑤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 [EB],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10-19, http://sky.cssn.cn/zx/shwx/shhnew/201610/t20161019_3241404.shtml.

会难题。中国现有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了一半多，并且还有 28% 的城镇留守老人和 47% 的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生活困难和体弱多病的问题^①。

然而，目前专门为留守老人提供支持的福利资源却极度匮乏。截止 2015 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总数不到 4.7 万家，每千名老人能分享到的养老床位不到 33 张，^② 总体呈现出供不应求、资金缺口大和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由此可见，人口与环境变动带来的冲击效应，不仅改变了家庭规模、居住方式和道德习俗，还改变了家庭养老的人口学基础。当前国内外较多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以这些成果为基础，从生育理性、结构效应、人口流动、长者权威、孝道文化以及利他偏好等角度，深入剖析人口与环境变化的冲击效应、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一、生育投资的经济理性

从养儿防老角度看，生育子女与货币储蓄具有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作用（陈皆明，1998；袁志刚，1999）^{[1][2]}。曾经一段很长的历史里，子女在物质和情感上的回馈，是人们进行生育行为的主要动力。作为能带来预期收益的投资品，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父母获得赡养的可能性及其充裕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家庭只需在数量和质量之间作出取舍，便可实现生育收益的最大化（郭凯明，2012）^[3]。

多子多福是家庭追求生育收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子女，不仅意味着更小的风险和更充裕的养老资源，还意味着更为满意的情感关怀。比如赵继伦（2013）^[4]的研究就表明，子女越多，父代对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的满意程度就越高。陈卫（2014）通过抽样调查发现，中国适龄婚育青年中，出现偷生、超生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比例高达 19%，这种冒险生育更多子女的冲动，从侧面证实了赵继伦（2013）^[4]等人观点的正确性。乐章（2016）^[5]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有无子女在幸福感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有子女的通常要高于没有子女的。

但尹银（2012）^[6]等人却不这么认为，研究发现更多的子女除了增加亲代的婚姻满意度之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牛楠（2014）^[7]认为，生育数量并不是决定老年幸福的唯一因素，增加教育投入，提高生育质量才是关键。

可见，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子女的数量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收入水平、性别差异以及户籍类型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王钦池（2015）^[8]认为，缩小个体收入差距，促进性别公平，加快城镇化建设，能提高生育行为对老年幸福的增进作用。

然而，从 1973 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无论是“生育一个好”的号召，还是“生二胎”的松绑，生育政策都没有跳出抑制人口生育的惯性，追求多子多福的生育冲动是不允许的，而晚生少生则是常态（解振明，2012）^[9]。

当然，生育政策并不是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唯一原因，人们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估算，也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任强，2007）^[10]。当前，急剧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明显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培养少数子女成为必然选择。当然，这也是因为子女能力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会对父母的老年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王钦

①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EB]. 新华网, 2015-05-14, http://education.news.cn/2015-05/14/c_127800298.htm.

② 甘贝贝. 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32 张[N]. 健康报, 2015-12-08, <http://www.jkb.com.cn/news/industrialEconomy/pension/2015/1208/381427.html>.

池，2015）^[8]。一般而言，能力越强的子女，给父母提供的赡养资源越充足。

可见，选择优生优育，注重教育投入，子女个人素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能让家庭中的老人更容易获得物质和情感上的富足。伍海霞（2011）^[11]认为，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子女，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显然追求质量的生育行为，强化了子女的赡养意愿及其力度。

不过，在经济高度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常态化的当下，无论是生育更多的子女，还是生育更优秀的子女，都不能完全消除家庭养老的不确定性。而发展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主体的社会资助体系，则能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家庭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王增文，2015）^[12]。所以，协调政府、社区和家庭力量，构建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能更好地筑牢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篱笆。

二、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与取舍

人口学家诺特斯坦认为，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人口生育状况会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逐步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转变，进入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慢慢消失（Lewis，1958；蔡昉，2010）^{[13][14]}。

贝克尔对社会逐步走向低生育的现象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认为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考虑是家庭自发抑制生育冲动的根本原因。Samuelson（1958）^[15]、Diamond（1965）^[16]和Aaron（1966）^[17]等人认为，当影响生育成本与收益的人口增长率、资本利率和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动后，将深刻影响到家庭老年抚养比和子女赡养能力。Lam（1993）^[18]认为，子女数量变少意味着单个子女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成长资源，日后成为高质量劳动力获得优厚报酬的机率就会大得多。

Galor（1993）^[19]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子女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生育的子女数量竟然越少，这表明显单从家庭养老功能看，生育质量确实对生育数量具有替代作用。所以，Zamac（2007）^[20]提出，将生育重心转移到生育质量上，不断提高子女的赡养能力，可有效应对生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生育质量包括优生和优育两个方面。历史上，关于优生的说法数不胜数，春秋战国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汉有“女不嫁消渴病”，就连柏拉图也说过“不对婚姻加以约束，人类就会走向衰败”（肖君华，2004）^[21]。其实，优生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结婚对象、生育时间和终止妊娠的选择，生育出体质健壮、没有缺陷的后代。

而优育作为高质量生育的另一面，主要是借助后天教育，提高子女的综合素养和社会生存能力。优育论者认为，人的天生资质相差不大，后天环境对人的塑造才是关键。只要在成长的各个环节，辅以正确的家庭引导和良好的学校教育，成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为了追求生育收益的最大化，在对生育偏好和生育选择作出调整时是有风险的（Rosenzweig，1980）^[22]。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路。由于政府职位稀缺，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失业者，家庭面临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比较大。而生育更多的子女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新生劳动力可以借助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张本飞，2004）^[23]。从而，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是有限的。

如果政府能从制度层面参与进来，人们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风险将会小得多（Entwisle，1984；Yoon，2001）^{[24][25]}。当然，过度依赖养老保险也不是什么好事，容易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养老保险体系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必须控制好（Oshio，2009）^[26]。所以，有必要建立与家庭养老互为支撑的综合养老保障体系，从根源上解决家庭养老资源不足和子女逃避养老责任的问题。

三、家庭结构效应

家庭结构效应是指生育率的变动改变了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互动关系(曾毅, 2009)^[27]。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结构在只生一个好的计生政策的鼓励下,从金字塔型变成了倒金字塔型,一对夫妇要同时养活1个小孩和4个老人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日趋普遍。此类家庭结构由于子女的唯一性、直系亲属连接的脆弱性和成员之间的强依赖性,很容易受到诸如婚姻、生育和寿命等突发变故的冲击(宋健, 2010)^[28]。

生育率主要通过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生活照料以及赡养负担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Gee, 1990; Schmähl, 1990; Ruggles, 2008)^{[29][30][31]}。然而,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年龄差距的存在,个体成员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扮演着自养和照顾他人的角色,并不需要太多的照顾,所以家庭养老危机也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般严重。

人的惯性思维通常会认为生育数量越小获得照顾的可能性就越低。但当考虑到生育数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后,结果就不一样了。生育更少,意味着单个子女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投入,这无疑会改善子女的社会生存能力和经济条件,进而提高对父母的赡养能力(Downey, 1995)^[32]。这也是当前社会向“少生、优生”转变的重要原因(李瑞德, 2005)^[33]。

古有“凡子事父母,当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及“还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之说。^①赡养并不只是给钱给食物,还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敬意、情感关怀和生活照料。通常,生育数量越多的家庭,越容易在生活和情感上得到满足(Chen, 2000)^[34]。比如张俊良(2002)^[35]的研究就发现,生育1个孩子获得赡养的可能性是43%,而生育3孩的可能性则是69%。这表明,子女越多生活越幸福的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显然,在增进老年福利方面,生育更多数量和生育更高质量,各有优势又各有缺陷。为了将家庭结构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除了优化生育政策和培育环境外,还得寻求外部力量的帮助,特别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和社区在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建设中的作用,为老年人创造阳光、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人口流动的衍生效应

根据《明律·户役》:“同居共财,孰非己”的记载,聚族而居、几世同堂的群居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以“亲缘、血缘”为纽带,以“同居、合灶、共财”为特征的居住模式非常普遍。郑军(2009)^[36]认为,老年人对居住模式的选择,与个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一般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选择分居,而在体弱多病的时候选择共居。

共居离不开土地对人的束缚,更离不开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当中国自1978年开启市场化改革之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摧毁了繁育故土人情的经济格局,大量涌现背井离乡的年轻人正在瓦解共居的社会基础。

人口跨区流动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子女之间的养老分工,比如居家者负责日常生活照料和病痛护理,而外出者则负责生活开支(张文娟, 2004)^[37]。二是外出子女在流入地获得好的就业机会,赡养能力得到了提高(Knodel, 2007)^[38]。三是居住分散化,家庭成员的亲情联络变得稀疏平淡(张文娟, 2012)^[39],空槽家庭及其留守老人的照料难题比较突出。

由于人口迁移弱化了家庭对子女的控制,父母获得赡养的不确定性风险必然会增加,

^① 司马光. 居家杂仪[M]. 北宋.

先前那种子女膝前萦绕的天伦之乐也会受到较大冲击(Chan, 1999; 杜娟, 2002)^{[40][41]}。同时,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受旅途时间、交通费用以及相关心理成本制约(Yap, 1977)^[42],不能在父母急需之时回到身边施以援手(叶敬忠, 2009)^[43],所以一些人口流出地不愿多生的倾向非常明显,这当然和出于生育耽误抓经济的考虑有关(莫玮俏, 2016)^[44],但更重要的是没有感受到生育更多所带来的好处。

空巢家庭和留守老人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便是人口流动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孙鹃娟, 2010)^[45]。中国人口主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空巢家庭及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在这些地区比较突出(段成荣, 2013; 张航空, 2015)^{[46][47]},而精神空虚、情感寂寞以及体弱多病又是空巢家庭的共性问题(卢海阳, 2014)^[48]。

人口流动还将一些诸如照看小孩、农业生产以及整理家务等本该由子女完成的事务压在了留守老人身上(Stloukal, 2001; 孙鹃娟, 2006)^{[49][50]}。同时,外出子女还因为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自动降低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和对父母的供养积极性(李华红, 2008)^[51]。虽然空巢老人可以通过参与生产劳动解决一部分生活来源(张桂蓉, 2012)^[52],但若得不到子女的援助,不断瓦解的乡村社会也会将他们推向老无所依的生活困境(怀洋洋, 2016; 李卓, 2016)^{[53][54]}。

由于市场化改革和就业机会的分散化,“父母在,不远游”^①的孝道传统正在被打破,让外出务工者心无旁骛的工作,和让留守老人得到妥善的照顾,理当成为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追求。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家政服务组织,满足多层次需求,另一方面又要调动社区和工作单位积极性,帮助留守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同时还可以通过筹办老年互助协会来重塑老年人的精神家园,为他们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归的娱乐场所。

五、父代权威的弱化与修补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父系社会,“父父、子子”^②等基于农耕文明、支配约束子女的长者权威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张海川, 2008)^[55]。

子女主动提供经济援助和情感关怀,部分是出于父母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当然道德习俗和国家政治的支持也不容忽视(陈皆明, 1998)^[1]。社会变迁过程中,父代权威作为约束力量,在维系赡养伦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子代作为作父母的利益延续,其数量多寡直接关系到父代的幸福感。

始于上古时期的父代权威虽然是确保子女具有反哺行为的激励机制,却具有时效性,只在子女成年之前具有约束性,一旦长大成人或者结婚分户就不灵了(洪煜, 1997)^[56],此后道德习俗、法律制度和子女的自觉性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有过一段经济集体化的历史,代际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对传统父代权威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子女成婚分家和谋求经济独立的行为日益普遍,亲子之间更多的是平等互利关系而不是臣服和驾驭,这一转变有助于解决子女赡养动力不足的问题(王跃生, 2008)^[57]。当然,老人照料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制度设计、政策安排和社会支持上(王跃生, 2010)^[58]。

当前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动摇了父代权威的人口学基础(朱静辉, 2013)^[59]。家庭结构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成员规模的缩小,正从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转变,几世同堂以及几个子女轮养的格局被打破。

与之同时,伴随人口流动而带的居住分散化,进一步削弱了父代权威的控制能力,昔

① 孔子. 论语[M]. 春秋战国.

② 戴圣. 礼记[M]. 西汉.

日子孙荣绕膝前的天伦之乐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求（辛妍，2012；邹佳，2013）^{[60][61]}。此外，中国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伟大转变，面对高度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家庭赡养危机重重，需要借助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对其进行全面改造（冯华超，2014）^[62]。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修补父代权威的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在继续弘扬尊老爱幼等美德的同时，尽快完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从制度层面保障居家老人的基本生活及其精神文化需求。

六、孝文化的激励作用与局限

孝道作为传统美德，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张苏，2015）^[63]。正如《孝经》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呕心沥血，子女赡养既是本分，更是义务。

孝道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还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同西方社会重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不同，中国社会比较关注亲子之间的纵向关系（张苏，2015）^[63]。西方理论界比较倡导个体自由选择论，认为父母的生育行为是自愿主动的，而子女的出生则是被动接受的（Daniels，1988）^[64]，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既不是道德约束，也不是法律义务，而是一种基于血缘的亲情和友谊（English，1992）^[65]。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更侧重于家庭经营。中国的国家特性建立在道德与伦理的结合之上，直接表现为家庭孝敬。子女对父母的敬畏和孝顺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家庭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二是数千年来，几世同堂的共居文化所凝聚的同情共感基础（潘光旦，1936）^[66]，三是当政者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借孔孟之嘴在全社会树立起来的所谓“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①。

孝道伦理的核心体现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关怀等三个方面。作为传统美德的孝文化，既响应了亲情的精神呼唤，又在融洽家庭关系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肖群忠，2010）^[67]，是确保父母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获得保障的道德制衡机制（潘剑锋，2015）^[68]。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冲击下，“孝，善事父母者”（《说文·老部》）以及“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所提倡的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依从和赡养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低生育率所引起的子欲养而力不足以及分散居住所引起的子欲养而力不达等问题，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对养老意愿、养老情感和养老方式的认知（李琬予，2014）^[69]。

一种源于西方、注重本我、追求个性发展的自由观念对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了大多数新生人口的常识性选择，（马尽举，2003）^[70]。亲子之前那种驾驭和臣服关系逐步被权利和义务上的对等互利取代。追求生活独立的分户而居和基于人口流动的分散而居，从根源上动摇了子为父纲的家长权威，同时也从社会网络结构层面瓦解了亲子互动的情感基础（鄢盛明，2001）^[71]。

随着父代控制能力的下降以及社会道德约束的宽松化，子女赡养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大力发展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作为替代性力量，意义极为重大。正如龙大轩（2015）^[72]所说，孝道伦理存于大义，为宗法赡养规制所依赖。为遏制弃父不养以及为子不仁的悖逆行径，完善相关赡养法规十分必要（谢婷婷，2014；马芳琴，2015）^{[73][74]}。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化只是能、从心理、精神和道德层面对赡养行为起到引领和规范作用，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具体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变革、社会转型的关键

^①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西汉.

时期，年轻人的生活环境日趋复杂，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协助他们做好赡养工作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七、亲缘利他行为的自律性及其局限

生育行为一方面浸透着养儿防老的自利动机，另一方面又彰显了自我牺牲的利他美德 Becker (1986) [75]。父母将部分资源用于子女培育和成长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便是利他动机的外在显现 (Becker, 1988) [76]。

与父代相比，子代的赡养行为也极具利他偏好 (Hammond, 1975; Bernheim, 1985; Cox, 1987; Cigno, 1993) [77][78][79][80]。由于子代的效用函数囊括了父代消费，父母的幸福感会直接影响到子代的效用 (Verbon, 1986) [81]。刘波 (2005) [82] 的研究发现，亲子之间的互利行为还能带动彼此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家庭财富积累和生活状况也会因此得到改善。Silverstein (2002) [83] 认为，子代之所以体现出极强的亲缘和互惠利他特性，是基于父母在幼年时所给予的情感关怀和生活照料。

然而，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却在家庭层面动摇了利他行为的人口学基础 (Martin, 1989) [84]。若能够制定一个与赡养负担相同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则能达到与赡养同样的效果 (Cigno, 1995) [85]。当然，面对生育数量的下降，亲代对子代的利他性投入也可从提高的子女社会适应性及其经济创收能力上得到补偿。洪恺 (2008) [86] 认为，若能确保“子代福利增量”与“亲代投入回报”之和超过培育过程中的利他性成本，那么对子代的利他性培养便是应对家庭养老危机的有效策略。

但要注意的是，养老不仅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求，还应包括精神和情感上的关怀。所以，发展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并不能完全抹杀掉子女赡养的作用 (MacGregor, 2006) [87]。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中逐利动机不断冲击人们道德底线的当下，受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迁徙影响，家庭成员同情共感和互惠利他的生活基础逐步趋于瓦解，一些诸如空巢家庭及其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 (张大勇, 2007) [88]，需要协调政府、社区、家庭和社会等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心有所属、老有所乐。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文献演进角度深入剖析了人口冲击与环境变动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养老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包括儿孙膝前萦绕的天伦之乐、和睦互助的亲情愉悦以及心有所属等方面的精神需求。人口与环境的变化主要通过生育理性、生育偏好、家庭结构、人口流动、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利他行为等中间变量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

养老防老是对繁衍生息这一动物本能的理性升华，人们不仅重视生育数量，还重视生育质量。在一个从鼓励生育向节制生育转变的国度里，多子多福必然要被优生优育所取代。为弥补生育数量上的不足，对子女进行精细化培养，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经济创收能力是一种理性生育行为。

人的生活习性及行为选择是外部环境长期塑造的结果。中国近现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简单非货币经济条件下，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拥有绝对控制权的长者权威在家庭代际更迭和成员互惠利他行为有序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受工业化浪潮持续冲击的影响，先前陶渊明式的闭塞农耕家庭生活渐行渐远。个体在高度分工的货币化经济社会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亲子之间不再是臣服支配而更多的是平等和互惠。道德囚笼的禁锢作用被弱化，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再是被迫被动的义

务，而是自发自动的感恩与关爱。

自1978年中国拉开市场化改革以及邓公“两个大局战略”推出以来^①，城市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一波又一波的青壮年背井离乡、远赴经济繁庶之地谋求发展机会，聚家而居的天伦之乐被分散而居的孤寂所替代，一些空巢家庭病无所托、老无所依的问题十分突出。

与此同时，受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生育观念变化的影响，少生甚至不生的越来越多，几世同堂的金字塔家庭结构逐步被“老年人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所取代，传统子女轮养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此时如果子女自身经济状况差或者赡养意愿不强，少子化家庭就很容易陷入养老困境。

所以，为应对人口和环境变动带来的家庭养老问题，我们在捍卫传统美德、调整计生政策和挖掘家庭自身潜力的同时，还得重视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和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参与进来，特别是对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等基础福利设施的建设，努力构建融合家庭、社区、政府和市场等多方力量的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为老年人创造舒适而富足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陈皆明. 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6):131-149.
- [2] 袁志刚, 宋铮. 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1999, (11):20-28.
- [3] 郭凯明, 龚六堂. 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J]. 金融研究, 2012, (1):78-90.
- [4] 赵继伦, 陆志娟. 城市家庭养老代际互助关系分析[J]. 人口学刊, 2013, (6):41-46.
- [5] 乐章, 肖荣荣.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与乡村老人养老倾向[J]. 重庆社会科学, 2016, (3):59-67.
- [6] 尹银.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J]. 人口研究, 2012, (6):100-109.
- [7] 牛楠, 王娜. 转型期子女数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养老影响实证研究——以安徽和四川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64-73.
- [8] 王钦池. 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幸福感[J]. 人口学刊, 2015, (4):12-24.
- [9] 解振明. 曲折、艰难、辉煌的中国生育转变[J]. 人口研究, 2012, (1):34-44.
- [10] 任强, 傅强. 经济发展下的边际生育行为——莱宾斯坦理论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60-70.
- [11] 伍海霞. 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J]. 人口与发展, 2011, (1):29-37.
- [12] 王增文, Antoinette, Hetzler. 农村“养儿防老”保障模式与新农保制度的社会认同度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7):46-56.
- [13] Lewis W A.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8, 26(1): 1-32.
- [14]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 (4):4-13.
- [15] Samuelson P A. 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the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8, (6):467-482.

① 两个大局战略由邓小平于1988年提出，详见高伯文2000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世纪之交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一文。两个大局战略是：首先，东部沿海先发展，西部照顾东部这个大局；然后，东部帮西部，东部要照顾西部这个大局。

- [16] Diamond P A. 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 (5):1126-1150.
- [17] Aaron H. The Social Insurance Paradox[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1966, (3):371-374.
- [18] Lam D, Schoeni R F.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arnings and Returns to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Brazil.[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4):710-740.
- [19] Galor O, Weil D N. The Gender Gap, Fertility, and Growth[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1995, (3):374-387.
- [20] Zamac J. Pension design when fertility fluctuates: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capit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7, (3):619-639.
- [21] 肖君华. 优生优育的伦理思考[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47-52.
- [22] Rosenzweig M R, Wolpin K I. Testing the Quantity-Quality Fertility Model: The Use of Twin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0, (1):227-240.
- [23] 张本飞. 孩子质量与数量选择的理论模型及其应用[J]. 西北人口, 2004, (4):17-19.
- [24] Entwisle B, Winegarden C R. Fertility and Pension Programs in LDCs: A Model of Mutual Reinforcement[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4, (2):331-354.
- [25] Yoon Y, Talmain G. Endogenous Fertility, Endogenous Growth and Public Pension System: Should We Switch from a Pay-As-You-Go to a Fully Funded System?[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1, (5):586-605.
- [26] Oshio T, Yasuoka M. Maximum size of social security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fertility[J]. Economics Bulletin, 2009, (2):644-654.
- [27] 曾毅. 人口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 人口研究, 2009, (5):148-152.
- [28] 宋健. 再论"四二一"结构:定义与研究方法[J]. 人口学刊, 2010, (3):10-15.
- [29] Gee E M.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anadian Families: Findings and Social Policy Implications[J]. Canadian Public Policy/analyse De Politiques, 1990, (2):191-199.
- [30] Schmähl W. Demographic change and social security[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0, (3):159-177.
- [31] Ruggles S, Heggeness M.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8, (2):253-281.
- [32] Downey D B. When bigger is not better: Family size, parental resource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5):746-761.
- [33] 李瑞德. 当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一项观念性的实证研究——以闽南山区 B 村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05, (6):34-40.
- [34] Chen X,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An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Journal, 2000, (1):43-65.
- [35] 张俊良, 俞德怡. 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变动趋势研究[J]. 农村经济, 2002, (12):19-21.
- [36] 郑军, 张海川. 家庭养老文化视角下探索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障体系[J]. 农村经济, 2009, (10):77-81.
- [37] 张文娟, 李树茁.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J]. 统计研究, 2004, (5):33-37.

- [38] Knodel J, Saengtienchai C. Rural parents with urban childre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Thailand[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7, (3):193-210.
- [39] 张文娟.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 *人口研究*, 2012, (3):68-80.
- [40] Chan A.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geing in Asia: An Introduction[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1999, (2):1-7.
- [41] 杜娟, 杜夏. 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J]. *人口研究*, 2002, (2):49-53.
- [42] Yap L Y L.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 A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7, (3):239-264.
- [43] 叶敬忠, 贺聪志.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 2009, (4):44-53.
- [44] 莫玮俏, 张伟明, 朱中仕. 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 CGSS 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 (1):90-98.
- [45] 孙鹃娟.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0, (1):28-33.
- [46] 段成荣, 吕利丹, 邹湘江.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 2013, (2):17-24.
- [47] 张航空. 人口流动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5, (1):95-102.
- [48] 卢海阳, 钱文荣.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的影响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6):24-32.
- [49] Stloukal L. Rural population ageing in poorer countries: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rural development[J]. *FAO Working Paper*, 2001.
- [50] 孙鹃娟.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 *人口学刊*, 2006, (4):14-18.
- [51] 李华红. 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研究——基于人口流动的视角[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35-39.
- [52] 张桂蓉, 史景军. 赡养与自理的均衡:农村留守老人家庭养老的代际伦理——以湖南省新田县 SH 镇的调查为例[J]. *伦理学研究*, 2012, (3):133-138.
- [53] 怀洋洋. 集居养老:乡村社会解构下留守老人的社会重构模式——基于山东 Z 村集居案例[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58-67.
- [54] 李卓, 郭占锋. 抗逆力视角下留守老人社会疏离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6):78-84.
- [55] 张海川. 西方家庭养老的时代演进及其启示[J]. *人口与发展*, 2008, (2):88-93.
- [56] 洪煜. 西周和秦汉时期的父权家长制[J]. *殷都学刊*, 1997, (1):28-32.
- [57]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 (4):13-21.
- [58] 王跃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J]. *社会科学研究*, 2010, (4):116-123.
- [59] 朱静辉, 朱巧燕. 温和的理性——当代浙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 (10):99-105.
- [60] 辛妍. 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的双重影响与政策选择[J]. *经济与管理*, 2012, (11):26-31.

- [61] 邹佳. 流动中的乡村家庭和个人[D]. 西南大学, 2013.
- [62] 冯华超, 钟涨宝. 社会经济转型与代际关系变动[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1-6.
- [63] 张苏, 王婕. 养老保险、孝养伦理与家庭福利代际帕累托改进[J]. 经济研究, 2015, (10):147-162.
- [64] Daniels N. Am I my parents' keeper?[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65] English J. What Do Grown Children Owe Their Parents?[M]. Humana Press, 1992.
- [66] 潘光旦. 中国之家庭问题[M]. 商务印书馆, 1936.
- [67] 肖群忠. 传统孝道的传承、弘扬与超越[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 (3):1-8.
- [68] 潘剑锋, 刘峰. 论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及其对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启示[J]. 江淮论坛, 2015, (3):20-24.
- [69] 李琬予, 寇戡, 李贞. 城市中年子女赡养的孝道行为标准与观念[J]. 社会学研究, 2014, (3):216-240.
- [70] 马尽举. 关于孝文化批判的再思考[J]. 伦理学研究, 2003, (6):35-39.
- [71] 鄢盛明, 陈皆明, 杨善华.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1):130-140.
- [72] 龙大轩. 孝道: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J]. 法学研究, 2015, (3):176-193.
- [73] 谢婷婷. 老年人赡养制度研究[D]. 山东大学, 2014.
- [74] 马芳琴. 浅议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的制度完善[J]. 知识经济, 2015, (9):13-14.
- [75] Becker G S, Barro R J. Altruism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 1986, (12):69-76.
- [76] Becker G. S. and Barro R J.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1):1-25.
- [77] Hammond P. "Charity: Altruism or Cooperative Egoism?" in E. S. Phelps eds. 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 [78] Bernheim B D, Shleifer A, Summers L H. The Strategic Bequest Motive[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6, (3):1045-1076.
- [79] Cox D.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3):508-546.
- [80] Cigno A.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without altruism[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4):505-518.
- [81] Verbon H A A. Altruism, political power and public pensions[J]. Kyklos, 1986, (3):343-358.
- [82] 刘波. 家庭财富的转移效用[J]. 经济管理, 2005, (9):70-72.
- [83] Silverstein M, Conroy S J, Wang H, et al. Reciprocity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 Over the Adult Life Course[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02, 57(1):S3.
- [84] Martin L G.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in Fiji, Kore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J]. Demography, 1989, (4):627-643.
- [85] Cigno A. Public pensions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comment on Nishimura and Zha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5, (1):169-173.
- [86] 洪恺, 李克强, 周亚. 家庭教育投资的动机与行为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5):550-553.
- [87] Macgregor T E, Rodger S, Cummings A L, et al. The Needs of Foster Parent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otivation, Support, and Retention[J].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06, (5):351-368.

[88] 张大勇, 于占杰. 家庭支持网与农村空巢家庭养老问题[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3):334-339.

Effects of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Changing on Family Pens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actors

ZOU Tiedi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Family with several generations that living under the same roof, was a better picture described in some allusions. Absolute controlling of production means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generational changing and reciprocal altruistic behavior.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on of family planning, market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s life and moral custom. The first was th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from Pyramid into inverted Pyramid. Then was the living mode, from cohabitation into separation. Of cours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lso from control and surrender into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In such a case, if the number of fertility was not enough and the quality was not high, which appears in a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endowment resources was difficult to ensure. At the moment, if we can motivating the enthusiasm of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market,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family pension system would become even easier.

Key Words: Population Shock; Population Mobility; Fertility Rate; Family Supporting; Support

JEL Code: H62, I38, J26